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电视剧《觉醒年代》

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作歌靠少年，努力与天争

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



《觉醒年代》也是一部思想史 也是一部历史剧

刘永昶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觉醒年代》是一部历史剧，也是一部思想剧。中国现代史上，最顶级的革命家、思想大师、文学大师如同群星在剧集中闪耀，哪怕是镜头构图中的一个配角，也有可能成为有着赫赫声名的历史人物。对于创作者的考验不仅仅在于考证每一个人物的细节，更在于如何用影像来传达那些如浪涛般奔涌澎湃的思想。

思想是抽象的，思想的落地则是具象的。《觉醒年代》确立了叙事时空的两个中心位置，即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新青年》杂志与北京大学。之于《新青年》，电视剧创作者采用了文字时空与人的时空彼此呼应的叙事策略。那些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文章，在电视剧中通常以写作、约稿、研讨、论战等人物故事的方式呈现，诸如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李大钊发表《青春》，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等。《新青年》杂志纸墨留痕，在电视剧镜头表现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当年的文章原样排版。所以当角色在剧中奋笔疾书或者热烈讨论时，就仿佛打开了时空隧道的大门——被凝结在文字中的时光刹那间流淌起来，那些充满激情、勇气、担当与智慧的思想，也在刹那间照亮所有过去与当下的读者心灵。

此外，《新青年》杂志及其文章也成为电视剧叙事结构中自然而然地转场节点。比如第三集中表现《新青年》杂志前身《青年》在上海创刊的段落，在画外音提示《青年》杂志的意义之后，镜头立即游转于广袤的时空：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兴奋地赞叹陈独秀“一出手就是个惊天大炸雷”，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长沙与蔡和森、李立三等人谈论《青年》杂志是个宝贝，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礼堂满怀激情地诵读《敬告青年》，民间艺人在上海街头以沪腔小调的形式介绍创刊号内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在人群中奔走叫卖杂志。这种平行蒙太奇的场景联结方式，既在叙事上巧妙地安插了其感性精神特点构成社会与主体经验的本真性的确认，更符合历史与艺术的逻辑。

《觉醒年代》在讲述“其首在立人”的革命的历史时，“情”之深之重是浸染其间的。最后一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之三人对坐，把酒言欢，在政治诉求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在“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中惜别，但友情之美妙确是革命史中的佳话。陈独秀与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爱恨复杂的亲情与他们自身的革命历程相交织，不仅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与彻底解放的民心所向的历史大势，也是“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抒情的革命历史的存照。更不用说剧中一次次激情澎湃、伟大而凄深的演讲，它们熔理性和感性于一炉，符合抒情的修辞策略和冷然神行的革命史的逻辑，聆命于历史的召唤和精神化历史的驱动，超越了时空，与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独特而深在的心理定式形成跨时空的呼应。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思想却可以通过语言文字载体恒久流传。面对百年之前那些著名的演说稿或者报刊文章，《觉醒年代》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一场场镜头前浓墨重彩的演讲段落，这些或辞采飞扬、兴奋地赞叹陈独秀“一出手就是个惊天大炸雷”，或睿智深沉的语言，是那个时代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当历史当事人的语言通过电视剧中的演员声情并茂地被艺术化再现时，便每每构成剧集单元中的叙事高潮。

试第38集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带领学生登居庸关长城这场戏为例。天高云淡，长城蜿蜒盘旋在群山之中，陈独秀在感慨“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压上楼”之后，一个转身，面向学生们开始宣告“我们理想的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这段演说即取自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发表的《本志宣言》；掌声响起，李大钊向孩子们提出忠告，“我希望你们以青春之力量……”，而学生们则齐诵“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作为回应。这段诵读也取自李大钊《青春》的原文。

任何华丽的台词分量都比不上这些真实历史文本的分量——历史用自己的声音做注解会更恰如其分。先辈们历史现场的“原声”映照者编者按照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设计的人物台词，形成了电视剧叙事“思想引领时代”的主基调——铿锵有力而又激情飞扬。这样的旋律曾经在中国现代史的深处一次次奏响，如今又在屏幕前召唤着新时代的中国人。跨越年龄世代阻隔的集体审美图景分明喻示着：历史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原乡，那些照耀历史的思想光芒同样会点亮人心。



觉醒年代

建党百年之际，《觉醒年代》在众多主旋律作品中尤受瞩目，以其所展现的浸染着特定文化色彩的深层世界和厚重的精神力量，感动和吸引着观众。这样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将历史看作是生命的复活，用影像重现1915年到1921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揭示了主义的选择和理性的召唤的必然，在真实的现场感和精神化的心理驱动基础上讲述了抒情的革命史。

《觉醒年代》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讲述了一个有关思想探索与“觉醒”的历史进程

从剧名“觉醒年代”便可看出，这部电视剧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讲述了一个有关思想探索与“觉醒”的历史进程。电视剧的开篇从1915年开始讲述，正值日本逼迫北洋政府签署“二十一条”，面临被如此凌辱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共和的失败让他们陷入痛苦和迷茫。第一集李大钊和陈独秀刚见面争论的就是如何找到救中国的出路。究竟中国的未来之路在哪里？如剧中李大钊所言，选择怎样的道路正是主义的选择，其特点是两个层次的变化：第一个层次是改变人的生存意识与世界观，并进而驱使第二层，即符号和信仰体系的改变。而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这也是《觉醒年代》的核心要义所在。

编剧龙平平在谈到创作剧本的过程时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像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不具备搞社会主义条件的。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会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是怎样找到这条道路的？”于是，《觉醒年代》重点讲述了人的思想的变化和觉醒的艰辛。1915年到1921年之间，尽管寥寥数年，可沧海一粟中风云迭起，相继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事件。

有趣的是，与以往对这段历史的着墨有些不同，《觉醒年代》不仅关注五四运动和一大建党，还对《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和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摹。这来自这样一种基本设定：文化的思想的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革反映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探索趋向。五四运动的起点意义是有思想源头的，这一改变人的生存意识，改变人对世界、生命的根本看法的回顾，体现出《觉醒年代》在历史观上的开阔视野和独特表达。编剧在编排情节时采用了纵横结合的写法，由此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形成一条内在的思想逻辑链条，是“觉醒”何为的最好注脚，也回应了“今天中国的一切，皆是从这六年衍生而来的”（编剧语）。共43集的《觉醒年代》花了九成的篇幅来讲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它们相当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史，其间无论是历史事件的还原还是历史人物的塑造都可圈可点，体现出拆解文化模式、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点也即“觉醒”之艰难。与第一集对中国未来道路的迷茫和痛苦相比，最后几集中，马克思主义的逐渐认定笃定给出了答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在对《觉醒年代》交口称赞的好评中，“真实”是出现最多频率的词语，这也是它之所以破圈的主要原因

在对《觉醒年代》交口称赞的好评

中，“真实”是出现最多频率的词语，也是它之所以破圈的主要原因。求真，是文艺作品的重要品质，已是老生常谈了，就像导演张永新所说，“任何一部作品都离不开真实二字，创作者要塑造真实的人物，表达真实的情感，要用一种真实的、历史的、辩证的视角看待和展现事物。”然而很多电视剧无法获取观众的好感，恰是不真实所致。

有鉴于此，如何以开放性的中西文化交汇、撞击为背景营造真实的历史现场感，便成为《觉醒年代》的重中之重。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下，一个个在教科书里出现的历史人物成为了可感的真实形象，完成了从概念化到形象化的转变，这也是此剧的可贵之处。在塑造历史人物时，往往会陷入因人设事的误区，为了制造戏剧冲突而导致人物性格的模糊和人物行为逻辑的不自洽，矫饰和遮掩是很难避免的，但《觉醒年代》的主创却有意识地规避了这些做法，从日常的维度来丰盈剧中人物和历史具体性。如此，观众看到了开篇里蓬头垢面的陈独秀，由此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形成一条内在的思想逻辑链条，是“觉醒”何为的最好注脚，也回应了“今天中国的一切，皆是从这六年衍生而来的”（编剧语）。共43集的《觉醒年代》花了九成的篇幅来讲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它们相当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史，其间无论是历史事件的还原还是历史人物的塑造都可圈可点，体现出拆解文化模式、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点也即“觉醒”之艰难。与第一集对中国未来道路的迷茫和痛苦相比，最后几集中，马克思主义的逐渐认定笃定给出了答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同时，《觉醒年代》真实的现场感还离不开服化道的“精”，细节中随处可见剧组的严谨。拿“巴黎和会”上各国的国旗来说，剧组特意组织专班进行考证，如制片人刘国华所说，“为了求得一个‘真’字，能发动的关系都发动了，能调动的一切资源都调动了。”剧中大到北大红楼的搭建复原，小到深深浅浅的车辙、残破的野长城、陈独秀放生的青蛙……这些都巧妙地融入情节中，自带叙事功能，构成一个自主的世界，作为叙事结构和文化预设进入历史的真实中。

《觉醒年代》的动人之处还在于书写了抒情的革命史

《觉醒年代》的动人之处还在于书写了抒情的革命史。以往革命史的讲述常常掉入于巴巴说教的桎梏，而《觉醒年代》塑造一个个带着忧患意识，对人的生存状态充满关怀的智者，却以“情”贯之，使整部作品主题原型与艺术表达在显示出剧中人物灵魂之深的同时呈现出一种含蓄浪漫的美学品格。

与兵舰大炮结伴同行的西方文化的入侵，对中国近现代史构成历史性的挑战。许多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而于世界性的比较参照

中发生了强烈的震动。作为既定模式的拓展，影视剧创作不能割裂地去看待抒情与启蒙、革命的关系，它们并不是各司其职，而是彼此相融，在这个层面上，抒情的革命史及其感性精神特点构成社会与主体经验的本真性的确认，更符合历史与艺术的逻辑。

《觉醒年代》在讲述“其首在立人”的革命的历史时，“情”之深之重是浸染其间的。最后一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之三人对坐，把酒言欢，在政治诉求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在“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中惜别，但友情之美妙确是革命史中的佳话。陈独秀与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爱恨复杂的亲情与他们自身的革命历程相交织，不仅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与彻底解放的民心所向的历史大势，也是“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抒情的革命历史的存照。更不用说剧中一次次激情澎湃、伟大而凄深的演讲，它们熔理性和感性于一炉，符合抒情的修辞策略和冷然神行的革命史的逻辑，聆命于历史的召唤和精神化历史的驱动，超越了时空，与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独特而深在的心理定式形成跨时空的呼应。

艺日无衣与子同袍



《觉醒年代》剧照